



第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

主题：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马克思

[首页](#) | [本局介绍](#) | [组织机构](#) | [编译工作](#) | [理论研究](#) | [期刊杂志](#) | [专家学者](#) | [文献信息](#) | [出版](#)

» [首页](#) > [专题](#) > [第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 > [青年优秀论文获奖论文](#)

全球金融危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构建

作者：万资姿 来源：第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

网络编辑：胡毅

发布时间：2010-11-05

点击数：

打印本页

[【发表评论】](#) [【关闭窗口】](#)

2007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次贷危机，2008年以来又引发了全球性的国际金融危机。今天，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之时，从操作层面来描述其产生的技术性失误和政策性弊端固然必要，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来认识此次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和影响也显得十分迫切。可以说，这场危机对我国人价值观念正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力都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世所罕见的挑战。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进一步明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重要性，探讨正确的应对战略、策略和相关政策，将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此，我们可以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全球金融危机也是价值观念危机

毫无疑问，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它的产生“不可能是一个原因导致的，而是两到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所致。”[1]因此，根源的探讨，需要全面分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金融危机，必须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限制的、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才是生产力的限制。”[2]显然，在危机的多重致因中，有必要对作为指导经济发展与运行的价值观念因素进行认真分析。

直接而言，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是指“没有购买能力而且信用程度又很低的穷人，在通过贷款买房以后无力偿还抵押贷款而引发的一种金融问题。”[3]在美国，长期以来，许多贷款机构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不惜采取购房“零首付”、“零文件”等贷款方式把贷款贷给完全没有还款条件和资格的“次级信用贷款者”。而一旦房产泡沫再也支撑不住，这些人无力偿还贷款时，次贷危机就开始逐渐浮现，全球金融危机最终彻底爆发。然而，“次贷”真的是金融危机的原因所在么？造成这次危机的深层价值根源又是什么呢？

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早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就曾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阶段已携带有潜伏病灶，一直存在着放松与制约两个相互制约的力量，一个是马克斯·韦伯所概括的以赚钱为“天职”的入世苦修的新教精神[4]——“禁欲苦行主义”，另一个则是德国哲学家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诊断出来的先天性痼疾——“贪婪攫取性”。贝尔将这其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5]。两种力量相互制衡促进了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可是，在20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因素却只剩下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平衡因素——“宗教冲动力”已被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耗尽了能量。为了使资本不断增值，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够正常地运行，扩大消费成为了必要，必须设法改变人们崇尚节俭的生活方式，让人们更多地花钱购物、消费。于是，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广受推崇。“新教那种天国道德大多已被淘汰，人世间的俗念开始恣情妄为了。……不再与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关，它关心的是如何花钱、如何享乐。”[6]不能否认，消费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它同时却带来了各种危机。金融危机的客观事实表明，消费主义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异化，带来了人的精神危机；造成了人与自然的进展关系，带来了人类的生态危机；与此同时，对经济发展也有着巨大的负面效应。“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借钱消费”、“提前消费”价值观念，不仅不会推动经济的发展，相反会造成经济危机，危害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消费主义价值观念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的观点，是有充分根据的。

除此之外，在消费主义影响下，人们也彻底抛弃了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享乐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极度扩张。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化已经完全转向享乐主义，它强调的是“恣肆横溢的精神自由”以及“精神的放纵、情感的按摩”[7]，“并带有典型的美国式强制色彩”[8]，由此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家争相奢侈，失掉了与他人同甘共苦和自我牺牲的能力”[9]，往往以暂时的短期的安逸舒适为代价换取最终的毁灭性后果。于是，在不计后果的过度享受、失控信贷下，次贷危机形成了，金融危机爆发了。可见，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也是一场享乐主义价值观的危机。

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者一味强调物质消费与个人享受，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但这一表现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却被“提炼为一种民族的文化精神”[10]。他们认为，自由竞争就是实现彻底的个人主义。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如果要放弃个人主义，就如同要改变人性，这是永远也无法完成的工作；认为放弃个人主义就等于摧毁人的最高境界。[11]在这样一种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就使得在人们“决定做一件事时，是因为这对我们自己有利，而不是为给别人带来好处”。于是，在金融市场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各类失信行为就此起伏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实际上，次贷危机的真正实质是，……资本信用危机、或者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信用危机。”[12]换句话说，此次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个人主义下的信用危机。

基于上述考虑，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和特点的时候，往往将它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进行比较。认为两者都属于经济危机，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都造成了严重的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但就具体特点和本质而言，有学者认为，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在生产领域中引发的，主要特点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带来了企业破产、信贷收不回来，从而引发经济危机。而这次金融危机主要是房屋次贷消费中引发的，由于消费者的过度消费，经营者的贪婪，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使消费信贷失控，引发了次贷危机，而后又演变成金融危机[13]。由此不难看出，尽管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以“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武器赢得了胜利，却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为实质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导致其社会发展中种种弊端的涌现，包括此次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种价值观的缺陷和危机。此次金融危机的祸根其实早已深藏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之中。可见，将这次金融危机指认为价值观念的危机，是有一定理由的。

在我国，这样一场危机或许在金融领域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在价值领域，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人的精神危机，具体体现在：导致个体层面的“存在性焦虑”和人际关系层面的“信任危机”[14]，使得传统熟人社会的信任、责任伦理等变得乏力，人们对社会生活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人际关系变得冷漠、虚假和毫无同情心，这一切又使得国家主流价值观受到严重挑战，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人在思想上产生混乱，甚至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产生疑虑、动摇，造成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滋长。比如有的将西方学术和政治思想作为普世价值，以之为标准片面评价中国社会的现实，否定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历史，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截然分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非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此，我们一定要明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科学性，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重要性。

二、金融危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反证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提出的战略任务，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意义支撑和生命之魂，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和目标任务，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

尽管此次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给我国国人的价值观念带来了一些冲击，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它却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进而催生了“《资本论》热”、“马克思热”，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是正确的，也在某种程度上反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性。

首先，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价值和强大生命力。马克思提醒人们关注“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

事实。”[15]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所面对的各种危机包括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并非处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之外，它们无非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实践的消极方面的尖锐化、极端化的集中表现。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程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16]作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实质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理论是相一致的。为此，有学者强调：“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高度货币化、金融化，使原来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比例失调，现在更多地表现为金融领域的比例失调，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比例失调与金融领域中的比例失调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机制。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即信用和债务关系可以通过创造需求来缓解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但金融领域的活动在缓解实体经济领域比例失调的同时，又把这种比例失调转化为金融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当金融领域的活动出现失控的时候，不仅使金融领域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且又会加剧实体经济领域的比例失调。……所以，源自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的过程，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特征。”[17]可见，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基本原理为研究现实的金融危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和分析基础。同时，此次金融危机也使得西方人重新认识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价值和准确性。因而，可以说次贷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而《资本论》的畅销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次，反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独特优势。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蔓延一方面证明了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特点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足和缺陷，进一步削弱了这种发展模式的生命力，破除了世界各国对单一化发展模式的迷信；另一方，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良好表现，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外在吸引力，向世人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具有的独特优势。[18]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例，在人类历史上，中国人民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结合起来。“而在此之前，市场经济只与私有制制度相结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也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不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商品经济二重性矛盾引发的危机最终是不可救药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商品二重性矛盾可能会产生危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危机又是可以规避、可以防范的。”[19]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的实验成功，从反面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优势。当前，我们要抓住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一历史机遇，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努力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和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一主题，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再次，警示我们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和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严酷现实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20]由此可见，只要国家继续存在，爱国主义就有其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意义。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对人们爱国主义思想的冲击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课题。金融危机爆发后，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西方国家不仅千方百计地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将危机的后果转嫁给其他国家，而且还倚仗其经济实力推行强权政治，竭力输出其政治观、价值观、文化观和生活方式，企图动摇作为民族国家主权象征的政府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以全球视野和开放意识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应对不断蔓延的金融危机。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和丰富发展，也是我们战胜金融危机的力量源泉。“发展离不开改革创新，发展要有新思路，这是我们多年来推进发展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21]我国30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之所以能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关键就在于我们通过改革创新，科学地探索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站在时代的新变化、实践的新发展和人民的新期待的基点上，不断探索创新，给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赋予了新的生命与活力。今天，全球金融危机也警示我们，在确定改革思路和具体模式时，应该坚持改革创新，切忌生搬硬套他国模式，应当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和金融发展道路。同时，也要积极教育和引导人民变危机为契机，以改革创新为手段应对各种危机，以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

最后，证明了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当今资本主义核心酝酿而爆发的金融危机，与其被渲染为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危机，不如说是被视为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与市场经济基础的诚信危机和道德危机。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华尔街一群只图私利不讲诚信的中介公司。他们为了牟取利益，在金融创新的掩盖下，表面上是把银行的风险转嫁出去了，但实质上大量的信用风险不仅蕴含其中而且被成倍放大，而由此所暴露的金融环境恶化，各种金融犯罪活动频发，无不与诚信和信用的缺失有关。与此同时，次贷的目的不论是金融机

构还是贷款人，都是为了不通过生产环节而赚取高额利润。这种目的下的经济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经济行为；从危机爆发后的表现来看，对待已形成的经济泡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听之任之，甚至不断去制造新的泡沫以转移风险、转嫁危机给外国，从而造成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可见，诚信危机、道德风险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基础原因。它再一次向世人证明：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作为一种现实的、可操作的、符合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标准的道德规范体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真正体现了效率与公平、义与利、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针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消极现象和社会公害，提出了鲜明的是非、善恶界限。它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做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爱国故土的国家观——“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服务社会的人生观——“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求是求真的是非观——“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敬业奉献的职业观——“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团结互助的和谐观——“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诚善守信的义利观——“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安分守纪的规范观——“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勤劳节俭的苦乐观——“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22]，都表明社会主义荣辱观“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为全社会树起了先进道德理念的标杆。它以惩恶扬善、荣辱分明的道德规范，启迪人们内省，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它用鲜明正确的道德导向，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为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良好的道德基础，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无形而有力的调控机制。”[23]当前，我们要切实抓住金融危机这一契机，大力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引导人民分清是非荣辱，明辨美丑善恶，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为良好、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形成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

三、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危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表明，必须努力规避风险，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时效性。对此，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其一，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4]邓小平同志也一再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5]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根本内容。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一位的、最根本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当前，我们一定抓住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一时机，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感召力、凝聚力，透过金融危机的表层现象科学认识和把握金融危机的实质，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其二，始终如一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公平正义。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6]，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获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27]作为价值观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样也是人们对客观的价值关系或价值事实的主观反映，属于社会意识的内容。“关注社会成员意识，关注人民大众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基础，只有切实关注社会成员意识，才能保证大众需求的真实性和现实性，才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人们共同遵循和维护的行为准则，潜入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深处，并作为人们的价值传统和文化精神长期稳定下来、持续传递下去。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言，如果广大民众没有出自内心的需要和重视，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自己利益休戚相关的意识自觉，那么无论外界的力量多么强大，哪怕是强制力量，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28]。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取决于人们自身经济状况和生活状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为人们所认同以及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基本任务是要始终如一地发展经济，以人们的利益为依归，改善民生，这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基础。“只有当社会主义的价值关系进一步理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事实进一步丰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才能真正地得到普遍的确立、巩固和提升”[29]，否则人们就会质疑和漠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此同时，还应注重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事实上，“人们容易忽视一个比较隐蔽的知识论问题：通常，人们只考虑正确知识应该是普遍有效的，却很少考虑到一种知识是否正确还要取决于它与利益是否一致。一种知识，哪怕是真理，如果与使用者的利益不符，它对于这个使用者而言就不是有效的真理。”[30]原因就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情形造成了不同的社会生活板块。在不同的社会生活板块基础之上，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必然很不相同，致使社会的价值体系出现程度不同的紊乱情状。”[31]因此，发展过程中，我们只有从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和群众的实际问题入手，及时解决相关的利益公平问题，

才能克服各种危机，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影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其三，积极有效地加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与弘扬。核心价值观应有本有源，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根基之上。回溯源头，传承命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应始终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应当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文化嬗变时期，人们价值观念也呈现多元、多样和多变的特征，在西方一些腐朽思想影响下，在市场经济追逐利益的大环境下，自私自利、背信弃义、损公肥私等不讲伦理道德的行为时有发生，迫切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在全民中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共识，使优秀传统伦理道德获得‘现代性’的品格”[32]。因而，需要我们注重深入发掘和认真梳理传统伦理的精髓要义，承接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并积极有效地将其转化到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形态当中，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将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价值观念相整合，作为构建新伦理道德体系和创新核心价值体系的路径，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以更有效地应对危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四，深入具体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教育引导。任何一个正确的价值体系只有被人民大众普遍接受、理解和掌握并内化为社会的集体意识，才能为人们遵守和信奉。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教育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此，刘云山曾强调：“要加强教育引导，营造舆论氛围，坚持以文化人，注重实践养成，强化机制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贯穿到各级各类媒体传播之中，渗透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之中，融入到日常工作生活之中，体现到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制定和社会管理之中……”[33]。而当前，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也确实一定程度上存在良莠杂陈的现象。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体现的价值观念加速地相互渗透，也更迫切需要主导价值观念统一思想、明确方向。这个时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导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思潮，加强教育与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为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就必须紧紧围绕体系的基本内容，并运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贯穿到领导干部的学习培训中，贯穿到广大干部的宣传教育中，贯穿到国民教育全过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此同时，还应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三进”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强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相适应的制度支撑，建立健全思想文化层面的社会沟通和协商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纳入民主化、规范化、经常化轨道，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参考文献：

- [1]田晓玲.后危机时代尚未真正到来——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N].解放日报, 2009-12-23: 10.
-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第561页。
- [3]顾钰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阐释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
- [4]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第36-37页。
- [5] [6] [8] [9] [美]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89,第13、117-119、118、131页。
- [7] 《享乐主义者宣言》,《羊城晚报新闻周刊:新闻专题》,2003-01-14。
- [10] 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北京:三联书店,1996,第209页。
- [11] 参见朱永涛:《美国价值观——一个中国学者的探讨》,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第53页、第57-58页。
- [12] 陆一:《美国政府“改写资本主义”是为了什么?》,www.wyxs.com,2008年9月20日。
- [13] 参见周中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伦理文化建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 [14] 贾英健,孔祥翠:《风险社会与人的发展》,《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